

罗振玉称其为“六朝楷书之冠”

“登百峰山诗残碑”是如何入藏故宫的

□张书功

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块“北魏登百峰山诗残碑”，此碑原在山东青州玲珑山，近代考古学家、古文字学家、金石学家罗振玉对此碑书法推崇备至，称其为“传世元魏楷书第一”“六朝楷书之冠”。那么此碑是如何进入故宫博物院的呢？它又是谁书写的呢？

残碑进京

郑道昭(455年—516年)，字僖伯，北魏荏阳开封人。北魏延昌二年至四年(513年—515年)任青州刺史，在任期间与其僚属在青州玲珑山刊刻了“白驹谷题刻”“登百峰山诗碑”“白云堂解易老题刻”“玄寺题刻”“哀子诗题刻”“解衣冠题刻”。其中“白驹谷题刻”“白云堂解易老题刻”和“玄寺题刻”尚存山中，而“哀子诗题刻”仅见于记载，“解衣冠题刻”不知所踪，“登百峰山诗碑”则仅存上半截，就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“北魏登百峰山诗残碑”。

玲珑山，位于青州市西南约15公里，古称石膏山，又叫百峰山、北峰山，今称玲珑山。玲珑山北魏刻石自刊刻之后，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直湮没无闻，少为人知。北宋金石学家赵明诚(1081年—1129年)，曾在青州屏居生活十余年，平日悉心搜求、遍访金石，可在其《金石录》中，仅著录了“后魏郑道昭《哀子诗》，延昌四年”题刻一则，既没有说明地点，也没有录其内容，对玲珑山其余题刻更是一字未提。

究其原因，大概北宋时期，玲珑山尚非名山胜迹，山势陡峭、路径荒僻，所以人迹罕至。赵明诚虽久居青州、遍访金石，却可能并未亲身登临此山，故而对山中石刻全貌并不清楚。此后，受扬帖抑碑的影响，玲珑山刻石也未引起后人重视，故又沉寂山林数百年。

直至清代，毕沅、阮元《山左金石志》仅著录“郑道昭白驹谷题名”；段松苓《益都金石记》亦只收录此篇，但段氏却从“康熙十一年游北峰山记碑”中得知山上尚有“白云堂中解易老题刻”线索，可惜未能寻访求证。后来青州拔贡丁培基与寿光廩贡隋其昌上山悉心访求，终于寻得，遂将其补录于段氏“白驹谷题名”之后。

清代光绪《益都县志》为首部全面收录玲珑山刻石的地方志，包括“白驹谷题名”“白云堂题名”“解衣冠处题刻”“登百峰山诗残碑”。其中关于“登百峰山诗残碑”，它是这样记载的：“断碑一，疑即郑僖伯游山诗，石归宗室盛氏。并侧。年月缺，书法似郑道昭。”

《益都县志》是由前后两任益都知县张承燮和李祖年主修，法伟堂总纂，孙文楷校补的一部地方志书。光绪十三年(1887年)，举人张承燮出任益都知县，倡修《益都县志》，并延请法伟堂任主纂。光绪二十八年(1902年)李祖年继任，又聘请孙文楷进行校补，并于三十三年秋刊印。

为什么要讲《益都县志》的成书背景呢？因为它关系到“登百峰山诗残碑”离开青州的时间。《益都县志》说“石归宗室盛氏”。又据罗振玉《石交录》：“宗室伯羲祭酒盛昱，藏魏残石，但存上截，前题‘诗五言登百峰山’，书势清劲隽妙，如山东掖县荣阳郑氏诸刻，盖亦道昭书。”由此可知，宗室盛氏，即爱新觉罗·盛昱，他字伯熙，又作伯羲、伯希，光绪三年



登百峰山诗残碑拓片。

(1877年)进士，官至国子祭酒。据《清史稿》记载，光绪十四年，盛昱以国子祭酒“典试山东”。同年他与山东巡抚张曜在青州倡捐创建“海岱书院”，并亲题匾额。由此可以推测：益都官方在修纂《益都县志》过程中访得此石，恰逢盛昱以国子祭酒的身份来山东主持乡试，又到青州与巡抚张曜筹办海岱书院，盛昱见到此碑甚是喜欢，于是益都官员就把它赠予了盛昱。

此推测在史学家柯昌泗《语石异同评》中可得印证：“郑道昭有百峰山诗残石，旧在山东益都。盛伯羲典试齐鲁，门下士取以为献。”“门下士”即门生、学生，盛昱为全国最高学府的长官，又担任山东乡试主考官，凡是科举出身的山东地方官，都可称其“门生”。《益都县志》为官修方志，志中明确记载石归盛昱，可见此事绝非下层人员私自授受，而是经由地方官认可或亲自赠予盛昱。“登百峰山诗残碑”就这样进京了。

流传过程

盛昱得到此碑后极为珍爱，将其藏于“郁华阁”。他虽交游广阔、友人众多，却从不轻易示人传拓，所以此碑拓本流传甚稀。民国建立，国体变更，王室日渐衰微，宗室家道随之零落。盛昱后人迫于生计，出售旧宅，此碑也随之易主，于1914年秋被临清人徐坊购藏。

徐坊(1864年—1916年)，字士言，号梧生，1913年后，他以清室遗老身份在逊帝溥仪小朝廷任毓庆宫行走，担任溥仪的汉文教师，民国五年(1916年)因病去世。卒后藏品逐渐流散，此碑又归于

张伯英。张伯英(1871年—1949年)，字勺圃、少溥，号云龙山民、东涯老人，江苏徐州铜山人。早年中举，曾任北洋政府陆军部秘书、国务院秘书长等职。1926年辞官后居京，以鬻字、鉴藏、著述为生。张伯英一生酷爱书法，早年从颜体入手，再学魏碑，卓然成家。清末民初，张伯英与赵声伯并称南北二家，又与傅增湘、华世奎、郑孝胥并称书法四大家。他还精于碑帖评鉴，《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》著录“登百峰山诗残碑”拓片，碑阳与碑侧拓文间有张伯英题跋考释一款：“光绪间平利张云心承燮知益都，访得此石，为宗室伯羲祭酒购运京师，彼时无铁道，毡包席裹，远行千里致之，之难可知。祭酒珍之，不轻与人拓，故少传本。甲寅(1914年)秋，石归临清徐梧生氏……梧生谓即郑道昭书，予谓非一人，其笔法有异。然可见北朝工书者之多矣”。由此跋文可知，徐坊认为此碑为郑道昭所书，张伯英却认为“笔法有异”，书写者应另有其人。

此后，此碑又入满洲镶蓝旗人荣厚之手，珍藏于“冠冕楼”。荣厚，字叔章，号朴斋，民国及伪满时期历任财政要职，精于金石鉴赏，富藏碑帖彝器，是当时北方知名的收藏家。1945年荣厚去世后，此碑一度下落不明。

据故宫博物院器物部研究员郭玉海《登百峰山诗残碑》一文记载：20世纪50年代初，北京图书馆普访传拓北京地区碑刻，于北京市“西城区后泥洼胡同二〇号伊宅”发现此碑并传拓，然未记录伊姓究属何人。1957年该碑入藏故宫博物院，档案记载仅为“购

入”，没有记录更多信息。

除盛昱、徐坊、张伯英、荣厚先后收藏此碑外，鲁迅等人也有藏拓并著录；而考证最详、推崇最高者当数罗振玉。他在《石交录》《贞松老人外集》中不仅详细记述了此碑的辗转经过，更对其书法推崇备至，称其为“传世元魏楷书第一”“六朝楷书之冠”。他说：“宗室伯羲祭酒盛昱，藏魏残石，但存上截，前题‘诗五言登百峰山’，书势清劲隽妙……祭酒矜惜，不轻拓墨，故流传至少。后祭酒嗣人售宅，此石遂为临清徐氏所有，寻由徐氏归铜山张氏，近又由张氏归长白荣氏。予定为传世元魏楷书第一。”又说：“石存上少半截，字大二寸，劲健浩逸，为六朝楷书之冠。”罗振玉最初认为此碑为郑道昭所书，后据碑侧文字“平东府兼外兵参军”细加考证，修正观点，认为诗为郑道昭所作，书写者则为郑道昭麾下僚属。

书写者是谁

那么此碑真正的书写者究竟是谁呢？

玲珑山刻石自被发现以来，多被认为是郑道昭所书，此说沿袭已久，但张伯英、罗振玉等人也提出过疑问，原因就是玲珑山刻石与莱州云峰山、大基山、平度天柱山诸刻风格悬殊，差异明显。

刘海粟在《读郑道昭碑记五记》中曾说：一位书法家前后期有变化，包括暮年突然变化，极为自然；一人同时有两种以上面目，也屡见不鲜。但前后期之间，两种截然不同的字体之间，也会有共性。突然大变，与前作全不衔接，后者又仅一例，不禁令人心生疑惑。其

中有一种或为他人代笔。

1983年至1984年，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、中国书法家协会山东分会、山东省博物馆组成联合调查组，对“云峰刻石”(含玲珑山刻石)开展了一次全面系统的调查。此次调查不仅确定了由郑道昭亲自手书的石刻，还认为玲珑山“登百峰山诗碑”与“白驹谷题名”书风统一，而与其他三山截然不同，当是郑道昭任青州刺史时的僚属书丹。

金石学家赖非先生撰文称：“这一组刻石(白驹谷刻石)，体方笔厚，沉着苍老，结体宽博端正，能于稳健中见到飘逸的神态。行笔轻重和谐，既不显得板滞，也不失之飘浮。这样的方笔书体，与云峰山、大基山和天柱山北魏各组刻石笔意相违，风貌迥异，多无共同之处。试想，一位书家，怎能在从光州到青州任职的短暂时间里，书体竟然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？我们认为这不但不是郑道昭手书，也不是他任光州刺史时那些书丹过摩崖的人们的作品，当是郑道昭任青州时的僚属所书。”除了从书法风格上得出上述判断外，支撑这一结论更为有力的实物证据，正是“登百峰山诗残碑”。

此碑原在“白驹谷题名”崖壁的上方，立碑座槽至今尚存。碑仅存上半段，残高78厘米、宽77厘米。正书。存9行61字，其中8行在碑阳，1行在碑左侧。无年月、无撰者、无书丹人，根据郑道昭任职青州刺史的时间，推测刻于北魏延昌二年至延昌四年(513年—515年)间。

此碑虽文字残缺、信息不全，其体例与文风却与郑道昭《论经书诗》《观海童诗》一致。二诗标题之下，均署有郑道昭姓名，如《观海童诗》题作：“诗五言登百峰山观海童郑道昭作”。“登百峰山诗残碑”首题则为“诗五言登百峰山”(下残)，依例其下亦应署郑道昭之名。

碑左侧残存文字为：“平东府兼外兵参军”(下缺)，下面应该是这位参军的姓名。“平东府”为平东将军府之省称。《魏书·官氏志》：神龟元年(428年)“七月，诏诸征镇大将军依品开府，以置佐吏”。郑道昭以光州刺史、加平东将军而转任青州，将军如故，故仍置平东府，此“外兵参军”即是他府中僚属。

史载郑道昭“好为诗赋”，云峰诸山郑道昭所作诗文均题署名，“登百峰山诗”与其在光州时所作诗文风格、体例相合。由此可推测，此诗也应为郑道昭所作，那么碑侧这位参军极有可能就是书丹人。“白驹谷题名”与此碑书风一致，也应出自这位参军之手。

“登百峰山诗残碑”自青州深山访得，历经数位名家辗转递藏，最终入藏故宫博物院，这本身就是一段足以称道的金石传奇。它虽残缺不全，却为考证玲珑山刻石的真正作者，提供了最为直接、关键的实物证据。其书写者虽是郑道昭麾下一名普通僚属，书法却被罗振玉等历代金石大家推崇，由此可证张伯英所言“北朝工书者之众”不虚，也可窥北魏书法人才辈出、书风昌盛之面貌。